

访原国家图书馆“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”主任周迅

古籍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 李东晔

应当说，我既是代表单位，也是代表个人去拜访周迅先生的。之所以说代表单位，是因为国家图书馆于 2009 年元月，在原古籍馆“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”的基础上新成立了“方志馆”，而周先生作为前者最重要的创建人之一，第一任（也可能是唯一一任）主任，似乎应该说点什么。而我个人，更准确地讲，则是带着一种迷惘去拜访先生的，期望这位曾经开创了我们现在这份工作的前辈，能给我指引出一个方向。

与周迅先生曾有过一面之交，那时我刚刚进馆工作，正在原来的参考咨询部轮岗，碰巧周先生去那里办事，于是简单打了一个招呼。后来又耳闻周迅先生是国图当年的“才女”，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，懂几国外语。再后来，我也调入“家谱与地方文献中心”工作，对于这位似乎有些“传奇”色彩的前辈更加充满了好奇。于是，2009 新年过后的一天，我坐在周迅先生面前，听她讲述自己的经历：

周先生 1935 年出生在苏州，父亲是位工程师，从小就跟随父母“走南闯北”。14 岁参军时，她只在学校念到初中。所以，周先生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我真羡慕现在的你们，能有机会读到硕士、博士”。周先生在军队机关工作了几年之后转业到当时的北京地质学院工作。之后，得益于当时国家的一项鼓励政策，一心想读书的周先生终于如愿以偿，于 1956 年考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。但那是个“热火朝天”的年代，“我们当时是五年制的，但那五年里，我们三修海河，在开滦煤矿呆了 8 个月，还在农村呆了一段时间……我连毕业论文都没有写过”！不无遗憾地从南开毕业，周先生原本希望能够在中科院历史所继续深造，但后来却因为各种原因分配到了当年的北京图书馆。

从 1962 年到 1989 年，周先生的工作关系一直隶属于北京图书馆的参考咨询部。但是应当说，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之前，周先生与当时我们国家大多数人所遭遇到的境况是相似的，“浪费了很多时间”！可也就是在那之后，年逾 40 的周先生开始学习日语。当时国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，周先生敏锐地发现了我们在学术发展上与国际学术界脱节的现实，于是就从日文有关“中国研究”的文献入手，主编了《论古代中国 1965-1980 年日文文献目录》（1984）。这用她的

话说，是“边学边用”。尽管周先生一直谦虚地说自己哪门外语都不通，但让人不得不佩服的是，国人常常拿“三十不学艺”为自己开脱，而周先生却有在不惑之年挑战自我的勇气。

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国家开始逐渐恢复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，到80年代中期达到了一个小高潮，还专门成立了“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”。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，1989年北京图书馆准备筹建一个“地方志”阅览室，周迅先生出于几方面的考虑担当起了筹备人的角色。首先，她认为自己虽然在图书馆工作了二十多年，一直忙忙碌碌的，但却没有在某一个专门领域有所作为，所以希望能借“地方志”成就自己学术有专攻的心愿；其次，是出于对文津街老馆的一种眷恋；最后，考虑到了自己上下班交通的相对便利。

筹建之初的二三个月里，主要工作是在馆里的各个部门“找方志”，她几乎是在孤军奋战。不过，得益于多年来从事参考咨询工作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，她从七八处地方，把那些按照不同分类法、划分在不同类别中的地方志目录卡片挑出来。“线装书（现在的普通古籍）起了很大作用”，周先生回忆说，“善本书目比较麻烦，但是他们还是给我面子，让我复制了整套的目录。”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提出一个可行性方案，但是令她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有意思的是，方案的核心问题是“是否成立这个‘地方文献中心’”。因为没有过先例，所以关于这个“中心”的建立，馆级领导那里就有几种不同的意见，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如何处理“专藏阅览室”与“综合阅览室”之间的关系问题。另外，在“地方志”与“地方文献”的关系，“综合志”与“专业志”的关系，“线装”与“平装”的问题，是否要保证馆藏库的“完整”等各种问题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。为此，周先生设计了三个工作方案，简述如下：

- 1、除保存本与善本藏方志外，尽可能地集中全部馆藏方志；
- 2、只集中馆藏方志复本，对无复本的方志进行复制影印；
- 3、不涉及到任何重要的馆藏方志所属的库，仅对古籍善本方志进行拍摄。

周先生说自己当时所谓的设计不过是各方领导意见的总结，而她对于这三套方案是有倾向性的，第二、三两套方案基本不具有什么可行性，因此最后的结果是按照第一方案实施的。

因为无论从购书经费、藏书空间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上考虑，将所

有的书籍，无论方志还是地方文献，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完整。在“博”与“专”之间也必须加以权衡，所以，周先生当年就主张，最好将来能够在本馆藏“地方志”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地方文献“信息中心”——一个文献信息数据库。在此，我要感叹，这种思路在今天信息漫天的互联网时代都很难得，更何况是二十年前。就“馆藏”建设而言，周先生认为规划是最重要的。比如对于“新志”而言，她之所以一直都不主张收“专业志”，就是基于当初“地方文献中心”规划的一种考虑。她认为，专业志太多太繁杂，不好划分范围，不好收“全”，也就是不容易形成体系，从而在使用上也造成一定的不便。

直到 1992 年“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”挂牌，三年的筹备期中，周先生与其他几位同事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“找书”。他们从全馆各个书库中把之前调查过的方志提出来，然后再从事编目、登帐、上架等准备工作。周先生说，当时的办公条件与现在无法相比，直到她退休前，“中心”一共才有 2 台电脑。

回忆当年，中心的人员并不是周先生有意挑选的，但人员配置都征求过她的同意，“都是些吃苦肯干的同志”。谈到这里，不知是否因为我是个博士的缘故，周先生说：“我感到最遗憾的一件事是，当时分配到我们那里的一个博士没能留下来。”她说，当时特别希望那位博士能够在日后的工作中起到带头作用，但考虑到那位博士之前没有图书馆工作的经验，所以希望他能够先多熟悉图书馆的业务工作。可惜的是，出于各方面的考虑，这位博士最后去了南方的一所高校。

提到在图书馆的研究工作，周先生肯定地说“研究无处不在，”但最关键的仍然是一个规划的问题，如何找到自己的一个明确的方向，从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中加以搜集和积累，做出一些扎实的工作。而就方向的确定而言，我想，这恐怕是困扰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问题。在目前这个信息爆炸，同时又很浮躁的社会环境中，有太多让大家随时转移目标的诱惑，如何能够把握住自己，确立目标，坚定不移地走下去，是做研究所要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。

问及她当年主编的《1522 种学术论文集史学论文分类索引》，说是也没想太多，因为当时有刚进馆工作不久的李凡和李小文两位老师都是学历史的，所以就商量一起做些事情，最后决定做一个“史学论文索引”。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工，然后就开始工作——首先基于馆藏资源查目录，复印、核对；然后再查找收集馆外资源，对于一些无法找到原文的也加注了说明；最后进行分类编排，前后

大概历时1年时间。“他们（两位‘年轻’的李老师）后来看到这个东西出来也很兴奋。”这恐怕就是收获成果的喜悦吧。

就地方文献研究而言，由于其关键词是“地方”，所以每个人很难做到“通吃”。因此，如果能够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一种地域上的划分，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某一地或几地的专家。如果需要进行某个专题的研究，大家还可以将自己领域中的相关内容整合集中。这样有分工有合作的模式就比较有意思了。

对于新成立的“方志馆”，老人家说自己已经退休十几年了，离开图书馆的工作太久了，而且现在图书馆的变化也很大，实在是说不出什么。而且笑说，自己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照顾生病的老伴，再有时间就是去老年大学学习书法和电脑。就如周先生自己说的，“我没有读过多少书，也没有做出过多大的事业。”但是大家之所以至今都保存着对她的敬意，我想，就是她那努力钻研、踏实务实的工作精神和作风感人至深。